

评李良志著《覆尽劫波兄弟在——战时国共关系》

温贤美

近十年来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史的研究,已逐渐引起不少学人的兴趣。据粗略统计,从1983年至今,我国大陆上已出版关于“国共关系”的专著约17种之多。全面、系统、深入地论述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专著中,李良志教授所著《覆尽劫波兄弟在——战时国共关系》一书(1993年2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),最具有代表性,篇幅也最大(共38.7万字)。

李书史料翔实,文笔流畅,观点新颖。书中对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过程中国民党方面的作用,国共两党的军事合作,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政治情况,中共在华中、西北、西南的统战活动,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国共合作方面的作用,中共长江局工作的评价,中共在整个抗战中的地位作用,国民党的反共活动,战时中美关系对国共关系的影响,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分裂的经验教训等问题,多有深入阐述和创见。

李书与国共关系史论著相比较,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:

一、作者运用大量丰富确凿的史料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,论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初期,两党多次秘密接触的情况(第二章)。作者特别阐明了:在中共尚未实行“联蒋抗日”方针时,蒋介石在日本制造华北事变,进行疯狂侵略的逼迫下,已于1935年下半年开始考虑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途径,并先后主动派曾养甫、谌小岑、宋子文、陈立夫、张冲、邓文仪等,分别通过国内和苏联的几个渠道,寻求与中共对话。这些史实说明,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功,

不全在中共,国民党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(李书第 413 页)。因此,如果说国民党被迫接受了国共第二次合作,这主要是被日本的亡华政策所迫,而不是迫于共产党的统战压力。其次,国民党急于“和共”,也是为了取得苏联对中国抗日的支持。所以,作者明确指出: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,是民族存亡之秋,国共两党相忍为国,相互作出妥协的结果(李书第 431 页)。这些不同于以往一些论著的新看法,是符合历史实际的。

二、作者列举大量史实,论证了武汉沦陷后,在日本加强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的情况下,虽然蒋介石加剧了国共摩擦,共产党也多次进行反摩擦斗争,但是,“从国共关系的全局来看,两党合作抗日仍是主流”(李书第 260—266 页)。这个观点符合历史事实。武汉沦陷后,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,双方处于对峙状态,国民党的抗战不如过去那样积极了。1939 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防共、限共、溶共、反共的政策,并多次对共产党制造摩擦,掀起反共浪潮。于是,过去有些论著把武汉沦陷后,国民党的“消极抗战,积极反共”,阐释为国民党的反共超过了抗日,似乎反共是国民党政治军事方针的主导方面。这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了。为了澄清这些有失偏颇的看法,李书指出:武汉失守后,蒋介石虽然加剧了国共摩擦,但由于国家存亡终归是生死攸关的第一大事,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,因此国共两党主要仍致力于抗战;特别是由于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,在政治方面坚持团结,坚持进步,拥护蒋委员长抗战,在对待军事摩擦方面坚持“不打第一枪”、“退避三舍”,坚持“有理、有利、有节”的斗争原则,使摩擦始终限制在局部范围,做到了“摩而不裂”(李书第 260 页)。同时,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仍布置在抗日前线,从 1939 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,进行的著名战役有南昌会战、随枣会战、第一次长沙会战、桂南会战、枣宜会战、豫南会战、上高会战、中条山会战、第二次长沙会战等。这些会战,规模都很大,敌我双方兵力十几个师、几十个师,会战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左右,长者甚至一年,国民党军付出重大伤亡,有的战斗

是很激烈的。因此,武汉失守后,从国共关系的全局来看,两党合作抗日仍是主流;从国民党方面来看,其抗日的一面仍是主要方面,反共摩擦还是次要方面,并未超过抗日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,作者概述了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军队对日军进行的9次大会战,也概述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,并举了1940年八路军对日军发动“百团大战”的辉煌战例。

这样,书中不仅说明了“两党合作抗日仍是主流”这一命题,而且也澄清了过去较流行的对国共抗战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,如:大陆的一些论著中说,抗日战争时期,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,没有抗战,袖手旁观,坐待胜利;台湾的一些论著说,共产党在敌后“游而不击”;国外的一些论著则说,中国陷于内争而未抗日。受这些谬说影响,不少二战史的论著都不写中国艰苦、英勇的抗日战争。如英国人利德尔——哈特(B·H·Liddell Hart)著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》(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出版)就是如此。李书澄清了上述错误看法,使国共坚持合作抗日,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懈战斗的形象昭白于世。

三、李书第十一章以3万多字的篇幅,深入论述了美国的远东战略及其对国共关系的影响。国民党和中共对中美关系又有各自不同的战略。这些造成了中美关系复杂、多变、矛盾重重的局面。史迪威从美国战略利益出发,主张撤销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,并分给八路军一些美援军需物资,但史氏的主张被蒋介石拒绝。美国从其大国军事战略需要出发,提出由史迪威指挥中国战区的全部美军和“全部华军”(包括中共军队在内),以抵抗日军的进攻(李书第372页)。这种由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全部军队的作法,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。在这一点上,蒋介石坚决抵制了美国的要求,并强硬要求罗斯福召回史迪威。罗斯福权衡利弊。召回了史迪威。赫尔利根据美国战略利益需要,先搞了一个“扶蒋拉共”的骗局,失败后就赤裸裸地进行“扶蒋反共”,干涉中国内政,严重破坏了国共关系。作者这些论述,比以往同类论著更能使读者清楚地认识到:

美国虽曾支持中国抗战,但并非完全出于对中国的厚爱和主持正义,而是出于美国远东战略利益的需要;美国对中国内政的种种干涉,是影响和严重破坏国共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四、李书对史实表述严谨,匡正了以往有的论著中某些史实记载错误。如:过去有些国共关系史论著记载说:蒋介石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,李书记述为:“蒋介石没有参加五届三中全会,当时他由于西安事变,请求‘退居’浙江奉化老家‘休养’。他向大会递交了《西安事变经过之报告》及由他署名实由陈布雷书写的《西安半月记》。”(李书第103页)^①

五、李书行文流畅,通俗生动,在不少地方运用文学笔法状物绘景写人,烘托历史事件背景运用不少回忆录材料穿插于书中,对一些重要人物生平作简介,征引一些诗文,把史实情节写得生动有趣,可读性较强。作者还选用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,配合正文内容,插印书中,做到了图文并茂,使读者能从直观的形象资料加深对历史的理解。

常言说“金无足赤”。李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。如:周恩来、郭沫若直接领导的政治部“文工会”,在“国共关系”中也占有较重要的地位,存在的时间也较长,工作成绩很大,宜多加阐述。但是李书第195页只提到一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“文工会”,这是不够的。

(作者单位: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)

① 据查,《国闻周报》第14卷第8期记载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情况:“大会于15日晨在陵园总理陵前举行开幕式,同时合并举行中委谒陵礼及中央纪念周。计到中委汪兆铭、孙科、于右任、戴传贤、居正、冯玉祥、邹鲁、王法勤等170人。”都没有记载蒋介石到场。另据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《蒋介石家世》第36页记载:“1937年1月,西安事变中蒋跌伤腰部,回溪口养伤。这次回乡,在溪口家里办了两件事:一件是为他的哥哥蒋介卿办丧事出殡;一件是为蒋经国婚事补办喜事。”直到4月下旬才办完此两事。李书经过严谨的考究,匡正了过去有些论著讹讹。